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陈列的镇江唐代船形墓

大运河畔的唐代镇江爱情故事

□ 马彦如 张剑

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镇江作为京杭大运河江南段的起点，是大运河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全景式展示大运河的历史面貌与文化价值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里，也收藏展陈了不可忽略的镇江元素。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展厅中，两座并蒂莲般连在一起的实体大型船形墓格外引人注目。这对墓葬整体提取自镇江，据专家分析这两座墓葬可能记录着一段“唐代爱情故事”。

2016年，镇江大运河边的大港龙泉村发掘出一对独特形制的船形墓，船形轮廓清晰，保存完整，根据出土的开元通宝铜钱、陶壶和碎陶片等文物，专家们将墓葬年代锁定为唐朝，距今已有千年。墓主是一对夫妻，生活富裕，相当于当时的“中产阶级”家庭。这对夫妻或许正是因为生前恩爱，他们把“地下阴宅”建成船形，不仅像两朵莲瓣连在一起，墓葬之间还有甬道相通，寓意“生同衾，死同穴，死后灵魂也要一起升天”。

船形墓是因墓室的两侧壁向外弧出，墓葬的平面形状像一只倒扣的船而得名。从已经发表的墓葬资料统计，船形砖室墓发掘的数量不多，始见于东吴晋初，一直延续到北宋晚期，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河北、山西、陕西、辽宁（朝阳地区）也有发现。其中代表性的船形墓有江苏无锡赤墩里东晋墓、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句容西晋墓等。河北地区发现的唐代船形墓代表性的有定州舟形墓，晋县（现晋州市）唐墓等。

长江下游地区为山地、丘陵地带，地理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该地域水网密布，又紧邻东海，人们把船作为出行劳作的工具，早已普遍认识到船的形状和功用。古人认为，人去世后灵魂欲升天，需要用舟船迎接天神下降引导，将墓葬作为船形或可利用水道将灵魂送回故乡。



船形墓大多由墓室和甬道构成，墓壁两侧外弧，平面最大宽度在中部，部分墓葬后壁有楼阁式塔状结构。墓壁采用三顺一丁砌法，无壁龛。船形墓的形成与建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长江下游空气潮湿土壤湿润，普通形制的墓葬容易坍塌，船形墓墓壁的弧凸可以加强墓葬的负荷力，防止墓室因受四周泥土的挤压而坍塌，极大地提高墓壁的抗压力和稳定性。此外，专家认为长江下游及周边地区船形墓墓顶多为穹隆顶，它的产生与墓内祭奠有直接关系，为了便于祭奠，墓室空间不断扩大增高，由券顶向穹隆顶变化。

常见的四隅券进式穹隆顶就是一种于顶部自然收为圆形穹隆顶的砖砌结构，具有不用胎膜、稳固性高的优点。该构筑技术通常作为墓主财富或等级的区分因素，而这种墓顶的船形砖室墓在长江下游及周边地区发现较多，可以证明当时长江流域具有较高的经济水平。

中国的墓葬传统与宗教理论，特别是与生死观、孝道思想息息相关，无论是受到宗教信仰还是单纯的劳动工具形制特征的影响，船形砖室墓都体现了古人对传统葬俗中“事死如事生”观念的重视。船形砖室墓的发现为研究各地区丧葬习俗、不同阶级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资料依据，为研究此类墓葬的建造手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大运河是沟通联系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的纽带，也是镇江穿市而过的交通命脉、生活水道。作为运河沿岸的历史文化名城，镇江的城市格局及发展变迁与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船形砖室墓的出土，体现了镇江在隋唐时期人口密集、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与镇江发现的其他唐代大运河文化遗存构成了相关链接与佐证，对当地唐代时期墓葬风格和墓葬习俗有一定研究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将实体的船形墓葬整体运输到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陈，过程殊为不易。据媒体报道，为防止墓顶坍塌，墓葬被运抵扬州时尚未清理墓中的泥土，重量达55吨，无法从楼梯或电梯运输，工作人员费尽心思，不得已拆除了博物馆西侧部分墙体，才使它们最终被安放在博物馆内。

问道茅山三千年^①

□ 张春蕾 夏和生

第三章 高道大德

茅山道教，自东晋创立道教上清派以来，高道辈出、羽流云集。元代，茅山上清派、龙虎山天师派与阁皂山灵宝派等道派合流，上清派成为正一派的一个分支；明代，北方全真派南下传入茅山，上清、全真两派相互交流、相得益彰，演绎出仙气浩荡、千秋不息的道教文化辉煌篇章。两派中的高道，有的以传播道教教义见长，有的以研究茅山道教文化立足，有的以实践道教的法术、注重炼丹术、替人斋醮著名，有的以帮助百姓治病、感化众生而为世人称道。茅山也因他们的活动而遐迩闻名，真正体现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特点。

一、土生土长的茅山道士——葛洪

茅山的著名道士很多，但土生土长于句容和茅山本地的并不多，南北朝时期的葛洪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茅山主峰大茅峰北有抱朴峰，峰上有抱朴山庵和丹井遗址，相传就是当年葛洪炼丹修道处。现在丹井已不见踪影，但句容市区葛洪故宅的炼丹井历经1700年依然完好保存，位于句容城区观井街西北侧，并栏为清代所制，1999年被镇江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葛洪虽不是上清派宗师，但他是晋朝江南上层士族道教理论的奠基人，所以他的神仙道教思想与上清派仍有相通之处。

（一）葛洪生平

葛洪（283—363年），晋朝人，著名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句容县都乡吉阳里人（现句容市城区联盟新村周边）。他出生于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仙逝于东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年）。他是三国时期吴国著名高道葛玄的侄孙及再传弟子。葛洪的家族属于江南士族，世代都人任高官。他的祖父葛系历任吴国御史中丞、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大鸿胪、侍中、光禄勋等中央要职，还封了寿县侯，其父葛梯也曾做过吴国的中书郎、中护军等，吴国被晋灭后，西晋政权因他是吴国故官，开始还任命他为郎中，后来一再贬官，最后降为邵陵太守，表现出司马氏政权对江南士族的歧视和防范心理。

葛洪13岁时，父亲去世，从此家道一落千丈。他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中说：“贫无僮仆，篱落顿决……披榛出门，排草入室。”已完全从一个门阀世家降为贫苦百姓。但葛洪自小好学，在如此困境中仍不肯放弃学习，白天砍柴卖薪度日，夜晚抄书诵读求知，“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抱朴子·外篇自叙》），活脱是当代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模样。每天不抄完借来的书，决不上床睡觉，少年时抄录借来的书已多达百万字。到16岁时，他已博览万卷书，许多篇章均能背诵，以儒学知名于乡邻与当世。《晋书·葛洪传》称赞他“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说他学识丰厚在江南无人能比，著作之多，超过了班固和司马迁。

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张昌、石冰起义。吴兴太守顾秘时任义军大都督，写信邀葛洪任将军都尉，镇压石冰起义军。起义被镇压后，顾秘任命葛洪为伏波将军。但朝廷却“了不论战功”，并未录用他。葛洪对荣位势利和“立功”之业深感失望，想北上洛阳，收集典籍，以“立言”为立身之本。但此时司马氏集团内部互相残杀，酿成“八王之乱”，北上道路不通，江东陈敏趁势作乱，返归故里道路被阻塞。进退不得之际，故交广州刺史嵇含邀请他担任参军，于是他决定南下避乱。不料嵇含又被仇人杀害，他只得在广州逗留数年。他的博学多闻受到南海太守鲍玄的赏识，鲍玄在玄道之学方面深有造诣，能“逆占将来”（《晋书·葛洪传》），就是说能通过占卜预测未来。鲍玄把自己在玄学、医术方面的知识传授于他，并将女儿嫁给他为妻。这段时期他在玄、道之学方面有很大提高。

晋愍帝建兴三年，葛洪32岁，得以返回故里。后来的东晋元帝司马睿此时仍以琅琊王的身份担任丞相，念他当年破石冰起义有功，封他为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召他为官。但他早已无心仕途，一心向道，对朝廷征召一概谢绝。从当年欲往中原搜求典籍开始，到淹留广州数年，直到返回故里的这段时间，葛洪一直坚持著书立说。据钱穆考证，《抱朴子》一书《外篇》50卷，内篇20卷的写作当在这个时期（《葛洪年谱》）。他用茅山抱朴峰为名号和书名，足见他家乡这座道教名山的景仰和推崇。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

